

《文选》载宋玉赋内容新论

邓元煊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明确指出宋玉擅长赋体文学，并以此著称于世。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在其《骚赋论》中说：“赋何始乎？曰：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宋玉在赋史上的首创地位和巨大贡献，是不可泯灭的。《汉书·艺文志》称“宋玉赋十六篇”，多早已失传，现存者亦真伪难辨。《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实为伪托，几已成定论。多数人判为宋玉所作的《九辩》，属骚体，《昭明文选》即列入“骚”类。至于《文选》收入赋类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收入“对问”类的《对楚王问》等五篇，是否为宋玉作品，迄今争论犹大。我认为这五篇作品“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陈第《屈宋古音义》），是宋玉之作无疑。这一问题拟另文论述，本文仅就其思想内容略抒管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对这几篇赋的思想内容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主要的分歧点是有无讽谏意义。扬雄晚年悔于少作，认为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说：“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此后的评论者，或以为淫浮绮靡，或以为阿谀奉迎，对宋玉的赋多所贬抑。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引自《太平御览》卷587）朱熹称其为“礼法之罪人”，并说：“《高唐》卒章，虽有思万古、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讽一之有哉？”（《楚辞集注·序》）郭沫若说：“再拿传世的宋玉作品来说，如象《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所表现的面貌，实在只是一位帮闲文人。”（《今昔蒲剑》）还有人进一步认为，《风赋》“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帮闲文学”，是“借自然界的风作比喻来美化统治阶级的”（汤漳平《〈风赋〉是“讽谏”之作吗？》，《复旦学报》1979年第4期）。另一种意见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是具有讽谏意义的。班固与扬雄的看法不同，在《司马相如传赞》中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他在《两都赋序》中还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此后，刘勰曾指出：“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文心雕龙·谐隐》）《文选》李善注认为《高唐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转引《汉书》注），《登徒子好色赋》乃“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文选》吕向注《风赋》云：“时襄王骄

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苏轼说：“不知者以为谄也，知之者以为讽也。”（《书柳公权联句》）苏辙也认为“玉之言，盖有讽焉”（《黄州快哉亭记》）。今人余冠英更进一步发挥说，“《风赋》是一篇措辞巧妙、意味深长的‘谏’文字”，“把王公贵族和平民的生活作对比，指出贵贱贫富不齐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并“在言语之外，实际上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采取措施减轻人民的痛苦”（《〈风赋〉介绍》，《文史知识》1959年12期）。最集中深刻地揭示这几篇赋的讽谏意义的，当推陈第。他在《屈宋古音义》一书中，谈到《风赋》时说：“人君苟知此意，则加志穷民，又乌能已。故宋玉此赋大有裨于世教也。”还说《登徒子好色赋》“假辞以为谏”，“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十六字是“灵根”，“得其本”；说《高唐赋》“其末犹有深意，谓求神女与交会，不若用贤人以辅政，其福利为无穷也”；说《神女赋》之讽“在词之表”，意谓“王之妄念可以解矣”。并由此总括说：“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

以上两种迥然有异的见解，虽一反一正，两相对峙，但实际上都囿于传统的评价标准，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儒家诗教的束缚。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所谓“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同前），这一评诗标准被汉代文人用来评价辞赋。影响所及，以至于现代。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标准，但各执一端，乃因其着眼点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有的只看到渲染女色（如《登徒子好色赋》）或男女幽会（如《高唐赋》、《神女赋》）的一面，有的则着眼“曲终奏雅”的几句说教，因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有的则凭自己的揣度，加以贬抑或拔高（如对《风赋》的评价）。更有甚者，则进一步从《登徒子好色赋》谈“一点论”、“两点论”，从《风赋》中找“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客观规律，这自然离宋玉赋的本旨愈远。作家笔下的形象往往大于思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代的评论者根据自己彼时彼地的感触，去引申发挥，自也无妨，但决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宋玉身上。研究宋玉的赋，探讨其思想内容，也应该顾及宋玉的全人，顾及宋玉赋的全篇，并联系当时骚赋表现主题的特点及其与前辈（如屈原）的继承关系，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始能恢复其本来面目，揭示其真正的底蕴。我认为，《文选》所载宋玉赋决非淫靡阿谀的浮文，也不纯是“谏”文字，而是宋玉抒怀言志之作。

宋玉处于战国末期，其主要活动时间在屈原之后，即顷襄王时期。顷襄王本与党人为一丘之貉，国事遂一蹶不振，楚国逐日走向灭亡的绝境。据《屈原列传》载：“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由于完全抛弃了联齐抗秦的战略，且再次放逐了良臣屈原，楚国国势便每况愈下了。史载：“顷襄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十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郢。其秋，复与秦会穰。”“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七年，……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均见《史记·楚世家》）一味屈膝求和，贪图苟安，以致引狼入室，领土被日削月割，楚国之

衰败、灭亡已成定局。宋玉正处在这君王昏愤、谗佞专权、祖国多难之秋。对当时楚国的黑暗现实，他在失职后所作的《九辩》中，有具体而形象的揭示。“众踳蹶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农夫辍耕而容与兮，窃悼后之危败。”他目睹群小蝇营狗苟，结党营私，国家残破，政治经济危机皆日趋严重，预感到国家的危亡，因而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宋玉的一生，可以其“失职”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文选》所载宋玉赋，应是他前期的作品。宋玉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已难以确考。刘向《新序·杂事五》云：“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云：“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宋玉集序》则言“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见之王，王以为小臣”。看来“事楚怀王”的记载有误，《韩诗外传》就易“楚怀王”为“楚相”；是否始事屈原、继求景差已不可考，但做过小臣，很不得志，或是事实。王逸《九辩序》说：“《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是否是屈原弟子不可考，但由小臣进而为大夫，这是有可能的。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地位仍不高。从《文选》中的记叙，如“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高唐赋》），“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神女赋》）等也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地位确实不高，也不受重用，不过作一个侍从之臣，被楚王“俳优畜之”而已。这就象司马迁所自述的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他在《九辩》中写道：“怆恍怛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这可以和以上记载相互印证，看来他确曾任过职，但后来失职了，因此内心很是愤愤不平。在其任职期间，尽管地位不高，又“不见察”，但“意气不得，形于颜色”，并非谄媚取容、趋炎附势之人。他当时的思想情怀、品德修养，从《文选》所载几篇赋中，能够得到鲜明的印象和明晰的认识。

《对楚王问》是一篇散体赋，开后代文赋之先河。不押韵，但用对话体和排比手法，具有赋体文学的某些特点。刘熙载说：“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艺概·文概》）刘向《新序·杂事第一》记载了这篇赋，文字小异。《文选》所载五篇赋中，《对楚王问》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这篇赋是回答“士民众庶”的非难，针对来自各方面的诽谤据理力争，以明己志的。“士民众庶不誉之甚”，楚襄王也怀疑他“有遗行”，行为失检，因而据理向上申诉。所谓“士民众庶”是指各阶层的人，但锋芒所向显然是针对谗佞的群小和世俗的颓风的，不能说是与劳动群众闹对立，轻视劳动人民，自鸣清高。自然，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这种劣根性，但本篇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不是这样。他先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形成鲜明对照：把自己的志趣比作“引商刻羽，杂以流徵”，而把群小比作不识曲调的听众，因而“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把自己比作鸟中之凤和鱼中之鲲，“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把群小比作“藩篱之鷃”和“尺泽之鲋”，不知天高海大。然后点明主旨：“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这与《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的诗意是一致的，正表现了他对群小的藐视，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的志趣和情操。这与《九辩》的揭示也是相合的。“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当时谗佞当道，宋玉实处于群小的包围之中。但他遭贬失

职后仍不改初衷，决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以求瓦全。“曷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饕而妄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吃“嗟来之食”，这是他恪守的信条。“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仰慕诗人遗风，以义为重，不媮不苟，始终保持着耿介高洁的品格和节操。

《登徒子好色赋》也用对话体，且骈散相间，是典型的赋体文学。这篇赋写了楚襄王、宋玉、章华大夫的一席对话，其中心是针对登徒子的攻讦进行反驳，从而抒发情怀，表明心迹的。登徒子说宋玉“为人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连别人“体貌闲丽”都加以攻讦，的确是心思费尽。“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宋玉一一加以申说。“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一句，毫不隐讳地道出自己是继承了前辈（自然也包括屈原）的遗风的。在楚王追问之下，他就所谓“好色”问题进一步作了申辩。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虽“登墙窥臣三年”，自己却“至今不许”。而登徒子之妻“蓬头挛耳，龋唇历齿，旁行踠跛，又疥且痔”，他却“悦之，使有五子”。两相对比，有理有据。“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用侧面烘托和工笔勾勒，精心刻画了这一美女的形象。接着，写秦章华大夫称“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章华大夫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实际上就是宋玉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申说。写春末在郑卫溱洧之间所遇美女，“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他不禁用诗和花表达了爱恋之情。“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并援诗答谢，敬而远之。这一节由写美女的外貌进而深入细腻地写美女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神情步态，维妙维肖。最后归结说：“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谈论是否好色的问题了，而是进一步着眼于把好色与好淫区别开来。章华大夫是好色而不淫，而登徒子就简直是好淫了。从这一角度讲，说“讽于淫”是不错的，但这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赋中着力写美女的可亲可爱，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寓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屈原曾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而群小以“善淫”诬陷屈原。宋玉与屈原当年的处境有某些相同之处，而本篇也显然是假托一段对白来回敬妒贤嫉能的群小，表明自己的心志的。登徒子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箭靶。

《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姊妹篇，章太炎先生更认为是“本一赋分为上下”（《蓟汉闲话》）。二赋不仅在内容上有联系，写作上也有共同之处。这两篇赋显示出从骚体到赋体变化的痕迹和脉络，并已粗具汉赋规模。两赋正文前都有一段小序，具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的作用，主要叙述故事由来，交代作赋缘起。根据这两篇序可以了解到，《高唐赋》是宋玉向楚襄王追述楚怀王梦会神女的景况，《神女赋》则是宋玉向楚襄王叙说自己梦遇神女的情形。《文选》所载《神女赋》序原文是：“……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晡夕之后……”玉王二字错讹，古人早有辨证。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中指出：“……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后来明人张凤

冀、陈第等皆有补证。张凤翼《文选纂注》云：“此乃玉梦，非王梦也。旧作王梦，则于下‘若此盛矣’处不通。且‘白’字应体贴未有君白臣之理。”陈第也说：“愚谓‘白’字‘对’字俱不应属之君，张之言是也。”（《屈宋古音义》）论证充分，此说可信。

这两篇赋的内容，不是写一般的男女恋情，因而其主旨不是“讽于淫惑”，乃另有寓意。杜甫《咏怀古迹》有云：“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他是认为并非痴人说梦，而是有寓意的。但寓意者何，他没有说，只是觉得实在令人遐思，给读者留下悬念。张惠言说：“两赋盖屈子作也，屈子曾见用于怀王，故以高唐神女为比，冀襄王复用也。不然，先王所幸而劝其游、述其梦乎？”（《七十家赋钞》）我不同意“屈子作”、以神女自况的说法，但他却启示我们，作者的确是另有寄托的。如章太炎先生所说：“人情不能相舍者，莫如男女，故以狎爱之辞为喻。”（《薊汉闲话》）但所喻者何，神女的比喻象征意义在哪里，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揭示其内涵。我觉得，“神女”不是自况，而是他喻，是用以比喻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也不是用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而是寄托着对同志的渴求和实现理想的迫切愿望。“神女”是理想的化身，也是理想能够赖以实现的国家栋梁的象征。屈原在《离骚》中就多用比兴。在他“上下求索”，“高丘无女”之时，只好“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先求宓妃，可她“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次求有娥之女，再求虞之二姚，都终因找不到良媒而未能如愿。宋玉的追慕神女与屈原之“求女”，动机和目的相同，所用手法及其比喻象征意义也都是是一样的。

《高唐赋》写楚怀王梦遇神女，集中地描绘了神女住处——高唐的胜景。“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这是神女的自白。序中对高唐胜景作了总的赞叹：“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赋的正文先写巫山之高显，天雨新霁时百谷俱集、汹涌澎湃之势，以及鸟兽虫鱼林木花卉之状；次写登高远望所见山势之“谿诡奇伟”，在观俯瞰所见之万千气象，以及术士仙人聚会祭祷和楚王奏乐畋猎的情状；末写欲见神女必须择吉隆礼，忧国忧民，选贤任能，才能如愿以偿，进而长治久安，万寿无疆。在描叙中还结合抒情，插写了一些富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词句，如“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怵怅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賁育之断，不能为勇”等，更加渲染了环境气氛。这样写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高洁奇伟。而末段的议论，则意在说明只有圣君贤相才能与神女相会。这自然是在劝戒襄王，但不是“讽于淫惑”，而是要他改弦更张，以迎得“神女”的欢欣，重整朝纲。追述怀王之能梦遇神女，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在怀王统治的三十年间，正是由乱世趋向于统一的历史关头，各国间斗争异常激烈。当时已由春秋初年的五十多个小国兼并而成所谓战国七雄，而七雄中又以楚、秦力量为最强。苏秦“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语，正是对此时形势的准确概括。怀王在统治初期，也曾有过图强的要求。史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怀王为从长。”（《史记·楚世家》）因而屈原曾把对祖国深厚的爱倾注在怀王身上，为实现楚国富强、统一中国的理想而奔走先后。即使遭谗被逐，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屈原列传》）。宋玉也就是要用怀王梦遇神女，曾经励精图治的一段史事来唤醒襄王，这才是他写《高唐

赋》的真正用意。

《神女赋》续写宋玉梦见神女，则集中地描绘和塑造了神女美丽的形象。“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这是对神女总的赞誉。先写神女的姣丽，足使“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次写神女的情态，闲雅沉静，从容和顺，体态万端；再写神女的节操，“怀贞亮之絜清”，“曾不可乎犯干”；末写神女匆匆离去，自己“惆怅垂涕，求之至曙”。从形到神，从外表到内心，逐层展开，生动形象。末尾深切地表现了他对神女的爱慕和怀思，用意自明。宋玉继承着屈原遗留下来的“美政”理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在《九辩》中反复申说：“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他仰慕“先圣”，推崇“尧舜”，深知只有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才能使国家有复兴的希望。因此他严厉斥责群小举措乖张：“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何时俗之工巧兮，背规矩而改凿”；他因未遇“伯乐”而感伤，对“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的现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九辩》虽写于失职后，但这却反映了他的一贯思想。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他也只能象屈原一样“上下求索”，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于神女。神女之可望而不可及，可亲而不可近，含情脉脉而又匆匆离去，这正说明当时现实的黑暗，使他们不可能结合，去共同施展抱负，实现理想。这就是《神女赋》所要揭示的深层意蕴。

近年讨论得最多、争论也最大的，当推《风赋》了。刘勰云：“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钓赋》系伪托，《风赋》确也自成一体而另辟境界。这是一篇咏物赋，自然不是为咏物而咏物，也是有所寄托的。先总写风由小到大、从盛到衰的形成消长过程，这是自然界中的普遍现象，是共性；然后出人意料地把风分为雄风和雌风，分别写它们特有的情状，这是个性，是应该着重进行研究的。文中对两种风所经过的地方、历程和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描写。雄风“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极力铺叙了宫殿生活的豪奢。风入王宫，由春到冬，虽也有“回穴冲陵，萧条众芳”，“其风中人，状直慄凄慄，清凉增欷”的阶段，但其总的特征是“清凉”，具有“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的特异功能，为大王所独有。雌风则不同，“翥然起于穷巷之间”，“邪薄瓮牖，至于室庐”，为庶人所专属。居住条件简陋破败，风来又“勃郁烦冤”，“动沙砾、吹死灰、骇混浊、扬腐余”，其中人“状直慄混郁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醋嗽获，死生不卒”，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简直是一场特大灾难，与大王之雄风形成鲜明对照。风何以别雄雌？宋玉说：“臣闻于师：积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他认为这是由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决定的。陈第说：“夫风岂有雌雄？人自雌雄耳。以雌雄之人而当天风之飘飒，判乎其欣喜悲戚之不相侔也，则谓风有雌雄亦可。”（《屈宋古音义》）他认为这是不同的人对风的主观感受不同所致。宋玉本一介“贫士”，地位低下，生活也比较困窘，以致失职后弄到“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九辩》）的悲惨境地。因此，他能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能从客观的现实生活出发，运用丰富的想象真实地反映现实，通过两个世界、两个天地、两种生活的鲜明对照揭示现实的不平。写雄风，明褒暗贬，曲折地反映了对君王的不满；写雌风，笔力沉重，对受苦受难

的庶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这也就是《风赋》的主旨。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爱祖国、有节操的诗人，其爱憎是分明的，对人民的同情和关注也是必然的。这篇赋所表现的思想与前几篇赋的抒怀言志，自然也是息息相通的，从而完整地显示了宋玉其人的高洁形象。

以上对《文选》所载宋玉赋的内容逐一作了具体探讨，撇开有无讽谏意义的旧说，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宋玉不是屈原的叛逆，而是屈原忠实的继承者。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国势飘摇、群魔乱舞之际，大浪淘沙，确有不少的人变节了。但是，屈原的精神和思想后继有人，应该说宋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宋玉不是完人，他不可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样的地位和处境中，能有这样的思想和表现，亦属难能可贵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宋玉的具体情况，对他多所指责，并提出比对屈原还要高的苛求，这就不恰当了。诚然，宋玉的斗争精神和思想境界有不及屈原之处，但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对楚王问》中提出“曲高和寡”的问题，《登徒子好色赋》之着意区别“好色”与“好淫”，《高唐赋》、《神女赋》对富有理想光辉的神女形象的塑造，以及《风赋》的以物寓志等等，或发前人所未发，或进一步发挥了前人的思想，皆弥足珍贵。欧阳修早就指出：“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毛主席曾多次引用过宋玉这几篇赋，并认为将宋玉与屈原相比，“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在研究宋玉时，我们既要看到他的“略逊一筹”，也要看到他的“可喜之处”和“出蓝之色”，才能对他作出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得出可靠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文选》所载宋玉赋不仅在形式上属首创，内容也有所开拓，颇有“出蓝之色”，甚是“可喜”，应予充分肯定。

书 讯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介》出版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四川省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长、四川师大政教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骆天银副教授编著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介》已于去年八月由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除《导论》外，主要评介了宗教哲学思潮的新托马斯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试图融合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解释哲学。我国著名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刘放桐教授还专为此书写了《序言》。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介》是一部教材性兼学术性的著作。从教材性看，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适合高等院校的教学要求，具有实用性；从学术性看，它博采众长，求精求深，努力反映这一领域我国研究的新成果和作者的新见解，具有时代感。该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与重点相结合，介绍与评论相结合，批判与吸收相结合，学习与创造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特点。